

中国作家协会主办

ZHONGGUOZUOJIA

XIEHUIZHUBAN



# 首届鲁迅文学奖 获奖作品丛书

散文卷

(下)

华文出版社

中国作家协会主办  
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丛书

# 散    文

(下)

陈建功    编  
陈昌本

华文出版社

# 《秋 白 茫 茫》

(选 2 篇)

李 辉



李辉，1956年10月出生于湖北随县（今随州市）。1974年高中毕业后到山区茶场插队。1977年底考入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1982年初到《北京晚报》工作，1987年调《人民日报》文艺部工作至今。已出版《巴金论稿》（与陈思和合作）、《萧乾传》、《刘尊棋传》、《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恩怨沧桑——沈从文与丁玲》等专著和传记，出版《人地书》、《人生扫描》、《人在天地间——瑞典印象》等随笔集，翻译出版小说《看风景的房间》和散文集《枯季思絮》。1994年以来，在《收获》杂志开办随笔专栏“沧桑看云”，1996年开始在《新民晚报》副刊开办“静听回声”随笔专栏。近年来主编“金蔷薇随笔丛书”20种，参与策划“火凤凰文库”的编辑出版。

## 碑 石

### ——关于吴晗的随感

我有一个北京朋友，住在东厂胡同。

这里要算市中心的中心了，周围颇有些值得经常走走的地方。从胡同北边出去，穿过一条窄窄的胡同，便到了中国美术馆。由西往东，出胡同口，马路对面是北京人艺和首都剧场，南边一点儿，是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大楼和门市部，而往北走几步，过一个十字路口，便是老北京著名的隆福寺。隆福寺街上一个现在看来很寒酸的中国书店，这些年来，还真让我买到过一些很喜爱的旧书。东厂胡同的胡同东口，还有中国科学院情报中心，过去也是读书人和学者们常常光顾的地方，那里所收藏的图书，颇有些奇货，特别是一些外文期刊，甚至比大的图书馆还要齐全。

走在这样一条被文化团团环绕着的胡同，有时确实有一种安静和舒心的感觉。这当然还是十年以前的印象。

最初走进东厂胡同是在什么时候，我已记不太清楚了，应该是在大学毕业来到北京后不久。开始我并没有在意这个胡同的称呼，虽然听人说这里就是明代有名的特务机构“东厂”的所在地，但除了有一种新奇之外，我似乎对走在这条胡同里并没有过多的历史想象，或者别的什么特别感觉。一幢幢新起的楼房，已

经取代了老房子，只有少量斑驳陈旧的旧式屋檐，仿佛还残存着悠远的影子。那时，我当然没有寻旧的兴致，我的兴趣是在“五四”新文学方面，对与巴金、萧乾、沈从文等文人有关的胡同，我注意得较多，譬如萧乾度过少年生活的九道弯，沈从文住过的达子营，巴金、靳以他们创办《文学季刊》时住过的三座门大街，还有梁思成、林徽因居住过的总布胡同，我都曾不止一次地去踏访过。

是吴晗和他的文章，让我突然对这个胡同产生了兴趣。

大约十年前，为撰写萧乾传，我走进了科学院情报中心的图书馆，去查阅30年代的《大公报》。在沈从文和萧乾编辑的文学副刊上，我寻找着他们当年的踪影。在翻阅泛黄的报纸时，《大公报》的《艺术周刊》和《史地周刊》，也不时引起我的兴趣。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在1934年年底的一期《史地周刊》上，读到了吴晗的论文《明代的锦衣卫和东西厂》。

因为吴晗在“文革”中的遭际，也因为凑巧我就坐在当年的东厂所在地，看到这样一个题目，我便有了一种强烈的阅读欲望。于是，尽管我的兴趣不在史学，但还是把本来会匆匆而过的目光挽留住，读起吴晗的文章。文章我读得并不仔细，但我觉得好像这样一次匆匆的浏览，使我对吴晗多了一些了解，也对遥远时光里的东厂胡同，有了些许具体的印象。

许多考证和论述，读后都不大能记起，但吴晗所讲述的一个故事，我却从来没有忘记过：天启年间，有四个平民深夜里在密室喝酒谈心，喝至酒兴大发时，其中一人突然开口大骂宦官——

东厂的头领魏忠贤。其余三人听了吓得不敢出声。还不等那人的骂声结束，就有东厂的探子冲进来，把四人捉去，并在魏忠贤面前把那位醉后大骂的人剥了皮。过后，给另外三人赏钱放还，这一突发的惨状，把三人吓得变疯。这是一个令人恐怖的故事，吴晗选择它来说明东厂的淫威。

那天从图书馆出来，走到东厂胡同路口，目光顺着长长的胡同延伸，因吴晗的文章，我对那遥远的年代的感受似乎深切了许多。我想象着，当年为撰写这篇关于东厂的论文，吴晗一定不止一次走进这条胡同。那时的胡同，想必还保留着明清时代的风貌，他缓缓而行，在历史的陈迹中沉思。最近，读陈白尘的《牛棚日记》，上面记载说，“文章”初期史学界一次批判中宣部领导的大会在东厂胡同召开，陪斗人员中便有吴晗。我想，这该是他最后一次来到这个胡同。

因为这样一些缘故，东厂胡同成了我所难忘的几个胡同中的一个。

不知为什么，一进入明史研究的领域，青年吴晗就把目光注视在冤案上。在关于东厂的文章之前，他便发表了研究明代最大的文字狱胡惟庸党案的长篇论文《胡惟庸党案考》（《燕京学报》，1934年6月）。

胡惟庸党案是明代初叶的最大的党狱，前后十四年，一时功臣宿将诛夷殆尽，前后达四万余人。按照朱元璋罗织的罪名，胡惟庸的最大罪过是和倭寇勾结，阴谋谋反等。但吴晗在经过细致考证和研究之后发现，这完全是身为皇帝的朱元璋，为了铲除精干而专横的丞相胡惟庸所制造的一个冤案，从而为朱氏后代坐稳

江山铺平道路。吴晗这样写道：“而胡案的组织过程，根据当时的公私记载，很明显地摆露在我们的目前。在胡案初起时胡氏的罪状只是擅权植党，这条文拿来杀胡惟庸有余，要用以牵蔓诸勋宿将却未免小题大做。在事实上有替他制造罪状的必要。明代的大患是南倭北虏，人臣的大罪是结党谋叛，于是明太祖和他的秘书们便代替胡氏设想，巧为造作……”

研究这个冤案、写下上面这段话的吴晗，那一年只有 25 岁。

对青年吴晗来说，胡惟庸案的研究，表面上看，考证与辨析能力的训练，也许大于对冤案的情感投入。因为对于胡惟庸这个朱元璋的宰相，吴晗并没有好感，他用明人诸书所记中的“枭猾阴险专权树党”这样几个字，来概括胡的品格，可见一斑。

他更感兴趣的，想来并不是胡惟庸个人，而是因胡而蒙受惨祸的数以万计的功臣和文人，也就是他所说的“知识分子”。在开始对胡惟庸案产生疑惑的时候，吴晗 1933 年春节在旧书摊上购到一本《碧血录》。这本书记载着明朝天启年间，东林党的一些知名人士被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冤杀的史实。我相信，是这样一些东林党人的悲剧，让吴晗花费更多的气力，写出了他年轻时的力作。

他是青年。青年应该是拥有激情拥有热血的一代。他们对人世间的一切不平事，不管历史久远或者新近，都容易感受到强烈刺激，也最容易诱发他们去追寻，去研究，并在论说这样一些事情的过程中，获得心灵的丰富。

所有不平事中，历史冤案对于年轻学人，可能是最有诱惑力的课题。冤案必然是悲剧，而且浓缩得无比沉重，不能不注视



它，却又不愿触及它。它总是以一种复杂而奇怪的状态，让古往今来的许多人在它的周围徘徊。难以言说的起因，大起大落的曲折，意想不到的结局，所有悲剧因素，都能构成一部大书。

是悲剧，就有了震撼力；是悲剧，就能让青年人对历史的好奇，变为深沉的追寻，从而对生命的体验，便多了一些内容，对历史的拷问，也多了一层悲凉。

有了对东林党人的同情和敬意，有了对文字狱的憎恨，有了对生与死的忧虑，吴晗写于40年代的那本《朱元璋传》，才始终贯穿着悲切与苍凉。

在《朱元璋传》中吴晗花费最多笔墨的是对文字狱的叙述。他对做皇帝后的朱元璋的刻画，全是围绕这一点展开。他曾用文学笔墨，生动地描写了朱元璋对文人的杀戮：“网罗布置好了，包围圈逐渐缩小了。苍鹰在天上盘旋，猎犬在追逐，一片号角声，呐喊声，呼鹰唤狗声，已入网的文人一个个断脰破胸，呻吟在血泊中。在网外圈外的在战栗，在恐惧，在逃避，在伪装。”

不过，写得最精彩的还是对朱元璋之所以大兴文字狱的性格分析。传记的最后一节是《晚年的悲哀》，他这样描绘出朱元璋“高处不胜寒”的精神状态：“母族绝后，妻族也死绝了。到文正被杀后，诸子幼弱，基业还未稳定，孤零零一个人，高高在上，找遍周围，没有一个人可以寄托心腹的，得撑持着，时刻警戒着，提心吊胆，不让别人暗算。正如驶着独木船，水把独木船冲得团团转，几十年到不了岸，看着水是敌人，礁石是敌人，连天空飞的乌鸦也是敌人，谁都要害他，都在讥笑他，讽刺他。从得

了大权，做了皇帝之后，害了高度的紧张病，猜疑病，恐惧病。”在书写这样的词句时，年轻吴晗的心，一定揪得很紧很紧，他在为几百年前的那些蒙难的文人们叹息。

年轻吴晗便是以这样的姿势走进了明史研究，不，应该说他以这种方式开始了与历史的拥抱。历史加深他对人的认识与理解，历史让他感觉到生命的沉重。

这是他留给我们的惟一一部历史传记，早年吴晗所有的学识、热情、勇气、激愤、深沉，都浓缩在这部传记中，当时还没有人能够像他那样把朱元璋的性格刻画得如此透彻。看得出来，他很看重自己的这部作品，在后来的岁月里，他不断地修改它，重写它。不过他的修改一般被认为是失败之举。随着身份和地位的变化，随着环境的变化，他一次又一次将传记的文学性、批判性消解。读1964年最后一次重写本，我们几乎再也见不到早年吴晗的身影了，他的那些因年轻而激发出来的对文字狱的激愤、敏感、犀利不再是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上面所引述的片断及其类似描述几乎都荡然无存。如果把年轻吴晗和老年吴晗放在一起审视的话，我们会因为彼此之间的巨大差异而感慨万分。吴晗本人是否也会产生同样的感叹，我们无法知道。

当年欣喜地购到《碧血录》时，吴晗是以敬重的心情回望着那些东林党人的影子。他们被魏忠贤杀害，都死得冤屈而悲惨，《碧血录》中收集的就逮诗、狱中血书、绝笔、自谱等内容，在他面前铺展开一幅幅历史的惨状。阅读这样的文字，一个历史研究者，只要他不是冷静到极点的智者，就不能不为之动容。在友人记忆中总是充满激情的吴晗，当年就是这样。他得到这本《碧

血录》，感受最为深切的，当然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学者获得珍贵史料后的喜悦，而是作为一个热血青年，作为一个现实参与性极为强烈的学者，对生与死的忧虑。

他在读完《碧血录》之后，当即在该书的末页上写了这样几句话：“读完此书，胸中不知是甜是辣，因想及自己将来如何死，若死在床上则未免太笨拙，最好是自己作一主意，想一洒脱干净死法，活得不耐烦，便撒手告别，岂不快哉！”

这样的忧虑之中，显然还带着年轻人特有的单纯。每个人未来的人生走向，生与死的交叉与变换，其实远不是个人所能想象和设计的。

吴晗尤其如此。

他写出上面那段话是在 1933 年的 2 月，差不多到半个世纪之后，人们才在他的遗物中读到它。这时，吴晗早已在“文革”初期因为《海瑞罢官》的冤案而死于狱中。是谁第一个读到这段话，我不知道，想必他会怔怔地呆立在那里，默默无语。

胡适算得上吴晗的恩师。是胡适，年轻的吴晗才选择了明史研究，从而确定了自己一生的学业。他的建树，他的荣耀，他后来的悲剧，都是从这里起步。

1930 年在上海中国公学念书的吴晗（当时叫吴春晗），给担任校长的胡适写信求教，开始他与胡适的交往。他所写的学年论文《西汉经济状况》，颇获胡适赏识，后来胡适把吴晗推荐给清华大学史学系主任蒋廷黻，使因为数学只考零分而不得入北京大学的吴晗，得以进入清华大学学习。从那之后，吴晗便在胡适的

指导下，开始了明史研究。

读最近出版的《吴晗自传书信文集》（苏双碧主编，中国人事出版社），看到了吴晗胡适 30 年代的通信。“文革”中被作为“反面材料”的这些通信，今天成为了解吴晗治学经历的史料。

刚刚开始历史研究时，吴晗的兴趣是在汉代，但正是因为蒋廷黻和胡适的诱导，他把重心移到了明代，并按照胡适的指点，开始治学方法的训练。

在保留下来的胡适致吴晗的两封信中，最重要的是 1931 年 9 月 12 日的一封。信中写道：“蒋先生期望你治明史，这是一个最好的劝告。秦汉时代材料太少，不是初学所能整理，可让成熟的学者去工作。材料少则有许多地方须用大胆的假设，而证实甚难。非有丰富的经验，最精密的方法，不能有功。晚代历史，材料较多，初看去似甚难，其实较易整理，因为处处脚踏实地，但肯勤劳，自然有功。凡立一说，进一解，皆容易证实，最可以训练方法。”

胡适还具体告诉吴晗，应该先细读《明史》，并指导他如何作笔记，特别强调应该作“专题研究”之类的小论文，题目越小越好，要“小题大做”，千万不要一开始就做大文章。

对赫赫有名的胡适能够如此详尽地指点自己，吴晗无疑深受感动。同月 26 日吴晗给胡适写信，表示自己的感激之情：“上次先生所指示的几项，读后恍如无边旷野中，夜黑人孤，骤然得着一颗天际明星，光耀所及，四面八方都是坦途。”按照胡适所说，吴晗买来了《明史》，逐日点读，还做了几千卡片分为人名、书名、纪事三种，准备按类填写。在随后几年里，胡惟庸党

案、锦衣卫和东西厂、《金瓶梅》、晚明仕宦阶级的生活、殉葬制度等等，一个个明史的专题，便出现在吴晗的视野。他不厌其烦地小心求证，他按照胡适的教诲严格地训练自己，一个具有开创性的明史专家，由此脱颖而出。

尽管后来投身于革命的吴晗，与胡适分道扬镳，尽管吴晗后来的历史观与胡适大大不同，但他应该不会忘怀最初从胡适那里得到的教益。在50年代初写的《吴晗自传》中，吴晗就没有隐讳自己与胡适的这种师承关系，他承认自己过去“立场基本上是胡适的弟子”（《吴晗自传》）。甚至有人指出，在1954年展开的对胡适思想的批判中，作为胡适的弟子，吴晗并没有发表过批判文章，这在当时真是不可思议的事。

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对胡适思想的批判，随着政治运动的逐步升级，也随着政治地位的变化，吴晗不能不日益处在尴尬的境地。他无法回避自己与胡适曾经有过的学术关系，他不能不主动或被动地强调自己后来的分道扬镳，从而表现出今天的进步。于是，他对这些往事的回忆，便随之有所改变。

在千家驹的记忆中，吴晗对胡适一直是敬仰的。可以证明的是，他在吴晗的书房里，看到总是挂着胡适写的一副对联，大意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之类的话。这是胡适当年专门为吴晗而写的。我怀疑这个回忆的准确性。时间、环境、身份、性格，种种因素，吴晗已经不可能这么做。我猜想，千家驹所忆，也许是在西南联大时期的印象。

1962年，吴晗两次接受《北京日报》记者的采访，畅谈历

史研究和学习。此时的他，回顾自己的学术历程时，强调的是自学，而不再是胡适、蒋廷黻之类人物的教诲。他似乎并不困难地就把那些往事换了一种叙述，或者说在历史画面上，他根据需要涂抹上别的颜料。

他这样说：“胡适之做过我的老师，没给过我什么。我无从蒋廷黻那里得到什么知识。我之有些知识，主要是靠自学。”“清华大学原来是留美预备学校，买办性很强，1936年才改成大学的。当时史学系主任是蒋廷黻，一个十足的洋奴，他上课用英文，连对老婆讲话也用洋文，中文不通，不能写。他的文章都是由胡适改了发表，因为不通。他们外国历史知识有一些，但中国历史知识很少。在这种情况下，老师讲的不合我的需要，我需要的他们不教。我跟陈寅恪先生还学了三年，听他讲隋唐史。他研究得很细，如唐代李姓考，也没学到什么。”

以往他所看重的一切，现在似乎都不值一提。他的语气也似乎轻轻松松。可是，谁又能知道他的内心到底是怎样一种状态。他到底是真的否认了一切，还是有难言之隐？我们永远无法了解。

开始写这篇关于吴晗的文章是1995年的11月5日。一个巧合，距1965年的11月10日，差不多正好整整三十年。那一天，姚文元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把一部历史剧，和现实中的彭德怀罢官联系起来进行批判，的确是吴晗意料不到的事。当年在做自我批评的时候，他排出一个时间表，列出自己所写的一系列与海瑞有关的文章，无非是要

证明他写第一篇论海瑞的文章时，庐山会议并没有召开，彭德怀也没有罢官。

这辩护有他的道理。

不过，我觉得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庐山会议刚刚结束，吴晗就发表了一篇《论海瑞》（1959年9月17日《人民日报》）。在文章的结尾部分，他特地加上一段与现实有关的话，这段话应该说颇能说明作为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在政治上的明确态度。这段话是这样写的：

有的人自命海瑞，自封‘反对派’，但是，他们同海瑞相反，不站在人民方面，不站在今天的人民事业——社会主义事业方面，不去反对坏人坏事，却专门反对好人好事，说这个搞早了，搞快了，那个搞糟了，过火了，这个过直了，那个弄偏了，这个有缺点，那个有毛病，太阳里面找黑子，十个指头里专找那一个有点毛病的，尽量夸大，不及其余，在人民群众头上泼冷水，泄人民群众的气。这样的人，专门反对好人好事的人，反对人民事业的人，反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人，不但和历史上的海瑞毫无共同之点，而且恰好和当年海瑞所反对而又反对海瑞的大地主阶级代表的嘴脸一模一样。广大人民一定要把这种人揪出来，放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喝一声，不许假冒！人民群众看清他们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本来面目，根本不是什么海瑞！

这样看来，研究海瑞，学习海瑞，反对对于海瑞的

歪曲，是有益处的，必要的，有现实意义的。

吴晗是响应号召而突出宣传海瑞和海瑞精神。据有关文章记述，1959年初，毛泽东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尽管海瑞攻击皇帝很厉害，但对皇帝还是忠心耿耿的，应该提倡他那种刚直不阿的精神。会后胡乔木找到吴晗，请他为《人民日报》撰写一篇有关海瑞的文章。庐山会议前发表的《海瑞骂皇帝》，就是这样问世的。

《论海瑞》后面那段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文字，同样与胡乔木有关。文章写出后，交给了胡乔木，胡乔木忙于去参加庐山会议，回京后才看文章。他向吴晗提出一些意见，并告诉说，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曾经这样说过：提倡“左派”海瑞，不是“右派”海瑞，是真海瑞，不是假海瑞。吴晗所写的那些话，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临时加上的。

不管怎么说，这是一段颇值得玩味的話。

是出于长期以来已经形成的政治表态的习惯？是一种潜在的忧虑，不愿意人们把自己宣扬海瑞与彭德怀罢官联系起来？

两种因素或许都存在。熟悉吴晗的人，都曾回忆到他如何满腔热忱投身于革命，如何在不同场合感激和钦佩毛泽东对他的《朱元璋传》提出的修改意见，并由此而直接感受到一个伟人的伟大。这样一个早就与老师胡适分道扬镳的学者，一个担任政府要职的领导人，一个以崇拜心情仰望毛泽东的人，说他有意识把海瑞和彭德怀联系起来，用几百年前的往事影射现实，于情于理都难以成立。



吴晗是一个历史学家，文学从来没有涉猎过。可是，他却破天荒地在撰写大量文章之外，创作了招致人生悲剧的新编历史剧。这个戏从戏剧文学的角度来看，并不被认为是成功之作，而当时舞台演出的效果也不理想。有的京剧行家就曾指出，《海瑞罢官》由于是新编的，仓促上演，唱做都没有经过锤炼，所以没有什么好听好看的。演员虽然是第一流的，可是让善于演诸葛亮、以台风潇洒飘逸著称的马连良去演刚正不阿、敢于冒死上谏的硬汉海瑞，让善于演包公戏、唱做醇厚稳重的裘盛戎去演老奸巨猾的巧宦徐阶，在角色上来了个阴阳颠倒，那怎么演得好？

但是，对于吴晗这并不重要。在他看来，他在履行一个革命史学家的职责，他在用历史和文学的双重方式体现自己的现实作用。他乐意这么做。那个时候，艺术并没有作为所有文学艺术形式的决定性的因素，创作者也好，欣赏者和称赞者也好，看重的常常是政治的需要，甚至政策演绎的需要。

张文松是吴晗的朋友，他说他当时曾对吴晗写这样一个历史剧感到不解：写历史和写历史剧毕竟不是一个行当，为什么一个历史学家偏要跳行呢？不过后来，另外一件事似乎让他对此有所明白。

他发现在写过《海瑞罢官》以后，吴晗似乎对于写京剧更热衷了。有一次他去看吴晗，看到吴晗正在修改一本以《水浒》为题材的京剧脚本。“我问他写什么？他说是一个中央负责同志交给他一个任务，要他在这个剧本中添写一个女角色，因为那剧中人物全部都是男角色，太单调了。我听了很诧异，难道剧中人物